

斯蒂文·维托维克教授 (Steven Vertovec) 是德国马克斯·普朗克研究所宗教与民族多元多样化社会研究所的所长, 也是英国国会、欧盟、G8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顾问, 为欧洲移民政策提供了作为学者的专业知识和知识分子立场。



欧洲社会正在经历一场“移民转型”

——对话德国移民研究专家斯蒂文·维托维克教授

采访◎本刊特约记者 沈奇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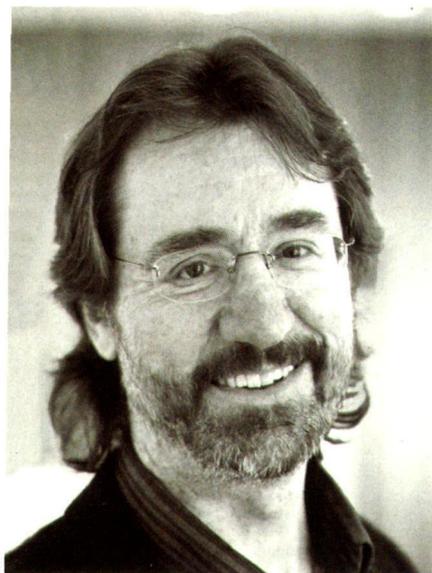
《社会观察》: 维托维克教授您好! 在您的书和过去的研究中, 反复提到欧洲社会的多样性和社会转型, 并称其为“超多样性” (super diversity)。您可以解释一下其中的联系吗?

维托维克: 我很坚信, 欧洲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深刻的转型过程。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, 将会有个新的社会从中诞生, 移民是其中很大的因素。现在的移民情况和从前不同, 30年前有大量的土耳其人到德国, 有大量的阿尔及利亚人到法国, 有很多巴基斯坦人涌入英国。现在的情况是: 整个欧洲, 在许多更分散的小地方, 有来自非洲、南美洲、亚洲等不同国家的不同移民人群。这显然对于欧洲的公共政策与文化都形成了挑战。

这个转型过程很困难, 因为许多欧洲社会认为他们的国家文化处在了被攻击的状态。我所认为的“超多样性” (super diversity), 是指无论人们以后如何定义“德国文化”“英国文化”或者“法国文化”, 不同的人在这些文化中, 都可以有空间来实践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, 比如印度宗教、非洲音乐等。这个我称之为新的欧洲精神。

《社会观察》: 这个过程形成的结构原因是什么呢?

维托维克: 在不少欧洲国家仍然有



反对这股新的移民浪潮的力量。我觉得不可能阻挡这个潮流。我们将继续看到持久的移民流动, 因为经济的全球化, 因为财富在全球的不均匀分布, 另外欧洲的社会在老龄化, 需要可以替代的人口来保持他们现在所有的生活质量。所以移民将继续进行, 超多样性却是新的文化互动, 这些因素正在使得欧洲社会转型。

《社会观察》: “超多样性”如何应用到具体的社会政策与实践?

维托维克: 我一直向欧盟政府推荐

的一个政策, 就是应当创造一些社会空间, 让人们可以互相接触、了解。通过一些共同的活动, 比如帮助打扫社区, 或者办个集市, 比如让孩子们一起活动, 这些微型的个人层面上的接触, 让人更容易接受他们身处的超多样性的社会。这是一种多民族、多种宗教、不同价值观都能和谐共处的社会。

《社会观察》: 作为一个学者, 您怎样和政府部门合作?

维托维克: 我和不少政府机构合作过, 比如欧盟、世界银行。我不得不说, 这是很叫人沮丧的经历。政府的时间表和学者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学者总是想, 如果要好好研究的话, 我们需要一两年。但是政府让我们写的报告, 往往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来完成。其次, 政府的决策者寻找的都是非常确切的解决方案——这种时候他们可以怎么做, 当下该制订怎样的政策才能转变某个事情, 等等。学者总是坚持事情是复杂的, 需要花时间来理清结构。政治家们没有那个时间。政治家必须做决定, 他们遵循时间表和预算。所以这就是其中的矛盾之处。

有时候我们研究很多课题, 写报告, 做政策建议, 但是政治家们往往忽略了我们的工作, 做出了以利益或者政

治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决策。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，所以，我们常常只能苦笑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您觉得作为学者，在政策决定中应当扮演怎样的角色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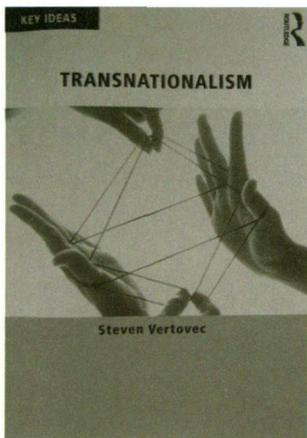
维托维克：我在过去学到的一点是：学者应该扮演的角色，不应该止于回答政治家们的问题，不能止于“有多少人”“是不是该这样做”。我不喜欢这个“提供答案”的角色，学者的任务应当是让政治家们学会去问更好的问题。学者可以改变政治家们对某个问题的理解，让他们有不同的角度来看

待一些问题，这样就能够制订更好的政策。但是这个很花时间，他们往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有时候，我们的研究也未必一定要报告给政治家，而是让公众知道。同时，学者自己也应区分“为政策所做的研究”（policy-driven research）和“与政策相关的研究”（policy-relevant research）。当研究是为政策所做的，那这研究就不是那么自由了，就会很窄。

《社会观察》：您的研究曾经影响了哪些政策？

维托维克：在英国，我的确改变了一些政策决定者的想法。比如“超多样性”这个词开始渐渐进入了英国政府的讨论之中。政府当时的政策决定要和不同的移民团体之间建立长期的联系。我的报告中说，这如果能做到自然好，但是现在大城市中人们之间的接触是在更微观的层面上发生的，有时候只有几秒钟，比如在街上借一份报纸看，问问时间，在广场上和孩子一起玩。所以不能只重视和大的机构、团体之间的长期联系，更要重视那些小的、微观的、人性化接触。■

《跨国主义》：新视野，新范式



在欧洲的移民问题研究中，跨国主义（Transnationalism）越来越引起关注：越南人如何在德国扎根？大量的非洲移民如何融入欧洲社会？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信仰印度教？一个移民的欧洲正在形成，不过，新世纪的移民和一百年

前不同，如今的移民充满了流动性。

“跨国主义就像全球化的宣言一样，它的过程和它的后果是多样化的，也是错综复杂的，跨国主义已成为了解当代移民活动的基本方式之一”，斯蒂文·维托维克在他的《跨国主义》（Transnationalism）一书中写到。

维托维克教授强调跨国主义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在整个过程中的转化（Transformation）。他认为过去重要的社会理论针对的基本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社会，21世纪的研究起点应当是全球化的转化，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化、政治的转化、经济的转化、宗教的转化等等。

维托维克教授在本书中添加了许多当下的前沿研究，比如跨国主义的网络社区研究。在虚拟世界里，人们可以轻易地“跨国交流”和“跨国生活”。在虚拟世界里，人们如何确立

自己的身份？移民团体如何使用网络工具进行宣传？新的媒体工具如何进入并影响了民族意识？这些都为学者提供了新的令人振奋的研究可能性。

跨国主义新视野下的宗教研究是维托维克教授的重要章节之一。宗教之于移民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共享一份文化认同，同时也是一个新的转化过程。这些渐渐形成了跨国主义的宗教研究的新视野。在这个新视野下，宗教旅行、朝圣可以看作是跨国的宗教活动。宗教团体的适应策略，人们在普遍的适应和特殊的传统之间的矛盾，成为了学者们丰富的研究宝藏。

（图片提供：斯蒂文·维托维克教授）